



欧洲与 超级大国

OUZHOU YU
CHAOJI DAGUO

〔美〕A·W·德波特 著

唐雪葆等译 徐存尧等校

—— 欧洲与超级大国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明琨
责任校对 徐培英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钱 锋

欧洲与超级大国
OUZHOU YU CHAOJI DAGUO

〔美〕A·W·德波特著

唐雪葆等译

徐存尧等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33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 3190·056 定价: 2.30元

DH82/22

关于《西欧译丛》的说明

战后以来，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学术界和外交人士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新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同有关研究和出版单位合作，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并编成一套《西欧译丛》。这套《译丛》包括整个西欧及其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些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些是带有偏见的，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都赞成，但是，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而且资料比较新鲜和充实，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欧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丛》读者对象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以及关心国际问题的、尤其是西欧问题的其他人士。

这套《译丛》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陆续出版。现在介绍给读者的这部《欧洲与超级大国》便是这套《译丛》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编译室

译 者 的 话

《欧洲与超级大国》一书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作者A·W·德波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的成员。

本书是一本从实力均衡的角度研究欧洲政治形势的专著。作者回顾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史，进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出现的新的政治—军事体系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他认为，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力量集团在欧洲对峙的现存体系，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是一种持久的均势，而不是不稳定的和过渡的。他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个体系符合美国 and 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实际利益。

该书代表美国学者中一派的观点，对我们了解西方学者关于国际关系基本格局的观点，有参考价值。但是，该书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对苏联、东欧国家和斯大林本人的一些看法，我们不尽同意。

由于该书文字艰涩，译文处理恐有不当，谬误粗疏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及专家同行不吝指正。

本书译者:

唐雪葆	序言和第一、 二、三章
黄授庚	第四章
王振华	第五、六章
宋天宇	第七章
王端瑚	第八章
黄跃秋	第九章
黄维新	第十、十一章

本书校订者:

徐存尧
吕霞
王端瑚

本书责任编辑:

程明琨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欧洲国家体系	11
第 二 章 体系的瓦解	22
第 三 章 欧洲的小阳春	36
第 四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系的更迭	60
第 五 章 超级大国的介入	77
苏联	82
美国	95
第 六 章 冷战开始	116
第 七 章 新国家制度的建立	142
第 八 章 两大集团体系的巩固：德国问题	173
第 九 章 来自东西方的挑战	201
超级大国：紧张与安全	203
德国：统一和分裂	217
第 十 章 西方内部的麻烦	227
安全	228
经济	236
携手合作和分道扬镳	256
欧洲的统一	265
法国的挑战	276
第十一章 展望未来	292

前 言

泰斯曼：“哎呀，咱们怎么能知道将来的事情呢！”

洛夫博格：“不错，可是总还是有一两桩可以谈谈的事情吧！”

易卜生：《海达·高布乐》

本书所述大多是往事，但主要仍着眼于未来。它不是一部追本溯源的欧美关系史，也不算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与此有关的专著，它只不过叙述了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事件：

——欧洲传统国家体系的衰亡。

——这一衰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美苏冷战，形成了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体系，它既是前者的结果，也是后者所派生的。这个体系囊括了欧洲各国，但不再以欧洲为中心。

——这一新体系现已定型，其性质与它缘起的冷战已毫不相干，而且很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符合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能左右局势的国家的利益。

任何研究战后欧洲国家体系并得出以上结论的人，都免不了要考虑：为什么当前大量有关欧美关系的分析往往过分强调这一新体系所面临的接二连三的挑战，而忽视了使该体系得以加强和持久的因素。如果说许多观察家忽略了自五十年代以来欧洲在力

量上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构稳定，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当前事件的历史根源认识不足。正如罗伯特·M·格兰特所说：“历史并非一桩桩孤立的事件。”^①这个道理经常被人忽视。譬如，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连贯地通观一八七〇年和以后的年代，就不会懂得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四年发生的事件怎样解决了一八七〇年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历史观对精辟地理解当代事件至为重要。

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欧洲人经历了力量集结的过程，这一过程和歷史不无关系。即使他们并不总是津津乐道于此，却也颇懂得其中的来龙去脉。这种痛定思痛而又清醒的认识正是新体系之所以强大有力的要素之一。一九四五年无疑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的分水岭，但它并不是今日世界开天辟地的第一年。不回顾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是更远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就不能理解一九四五年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这并不是要引用慕尼黑^②或罗马帝国的崩溃来解释当前的事件。这样做不是用历史来加强对现实的理解，而是滥用史实和曲解现实。不过，我们需要从三十年以来使公众、官方和学术界困惑不解的那些接踵而来的事件背后，找出某些前后一致的基本观点，将欧洲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看。我深知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得出的结论仍有待验证，本书的用意也正在于抛砖引玉。

本书的宗旨是要说明欧洲新国家体系形成的原因在于旧体系的衰落、崩溃，也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处理相互关系的方针。这套方针是美苏两国根据当时的形势（部分为历史所形成，部分为它们一手所造成）逐渐制定出来的。本书的立论依次如下：

① 罗伯特·M·格兰特：《奥古斯塔斯到康斯坦丁》（纽约，哈珀—罗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第13页。

② 此处系指巴伐利亚公国时代的慕尼黑。——译注

——中世纪末形成了欧洲国家体系，它在四个多世纪以来的特点是，成员国之间在外交上频频纵横捭阖，战争迭起，然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延续下来了。在各类国家体系中，这种现象确属罕见。这是由于欧洲各主要国家轮流坐庄，但又大体上得以维持均势。

——遏制了企图称霸的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的那个体系，没有能够遏制一八七〇年以后兴起的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暂且不论其动机和责任，一九一四年的德国同邻国相比，其实力可谓鼎盛已极，要不是美国干预，它是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称霸欧洲的。一九一八年以后，表面上恢复了欧洲的旧体系（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欧洲局势正常的标准），但是这种现象是人为的、不自然的和暂时的，甚至在一九三九年战事再起前就被德国的力量破坏了。然而，德国在一九四〇年建立起来的霸权好景不长，它被力量更强盛的美苏两个大国摧毁了。昔日的欧洲国家体系未能完成保持内部平衡及其成员国独立的这一最基本使命，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力量的对比具有深刻、持久和确定不移的影响，因此，它对欧洲的国家体系也有这种影响。一九四五年德国不仅战败了，它的权力和国家形式也被摧毁了。德国问题如此解决，终于使美国和苏联主宰了被分成两半的欧洲。这两个新超级大国原可以在几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冷战是很可能避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冷战所形成的欧洲分裂可能早很多年就成定局，甚至也有可能防止或者至少缓和这种分裂状态，可能性尽管很小，但未始不可以这样设想。然而，从历史和以往列强之间的关系来看，新的超级大国在一九四五年之后没有携手合作，而是你争我夺，这也不足为怪。美苏之间原有的意识形态分歧，以东欧问题为发端，引起了一系列具体的争执，竟至扩大成全面对抗。随后是双方各自巩固在欧洲

的势力的过程，从而使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后所产生的欧洲军事对峙得以在结构上固定下来。两个超级大国尽力扩大既成事实，使之终成定局，从而形成了与欧洲旧国家体系截然不同的两极体系。这一后果是冷战所派生的，而两个大国也未能充分意识到当时发生的种种事态。和旧体系最后五十年的情况相比，新体系在更大程度上以实力为其基础。

——在新体系中，欧洲国家发觉它们或多或少地依赖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即便如此，这个体系还是使它们得以履行维护民族独立这一根本的国家职能，尽管这种独立实际上（尤其在东欧）受到严格的（但不一定是不可改变的）限制。这一体系甚至还保住了和平。再者，曾经摧毁了旧体系的德国实力的问题，也由冷战一劳永逸地妥善解决了，此事绝非偶然。即使两个超级大国在一九四五年后不久就签订了分割或统一德国的协议，问题也不会解决得如此圆满。冷战将被分割的两部分德国牢牢地同两个集团粘在一起，以致德国统一问题不仅已从现实政治领域中被排除，而且这一做法还为大部分德国人所认可。一九五五年武装联邦德国彻底解决了德国问题，若想以其他某种欧洲范围内的方案和体系来解决德国问题，其可能性更显得微乎其微了。

——新的两极体系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延续至今，并派生出欧洲大西洋支系和欧亚支系。就结构而言，两者的作用相同，所不同者，前者主要为自愿组合，后者却出于强制。从外表看来，大西洋联盟已经发展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集团的组合形式。鉴于其成员国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它显然已远非冷战的派生物，而是一个组织更严密、更稳定的集体，其成员国在解决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老问题时，屡有裨益。

——欧洲自一九五五年以来风云变幻，新体系多次面临挑战，来自“自身”者，旨在改弦易辙，来自“外界”者（不管其居心何在），用意似乎也在于此。不少次挑战来势汹汹，可是没

有一次能使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只要承认这一事实，我们自然会考虑为什么这个体系竟会如此出人意外地稳定。看来原因有二：它往往符合绝大多数成员国，尤其是那些有力量影响这个体系的国家的最大利益；进一步说，则在于它既准确地反映了美苏之间的实际力量，又准确地反映了美苏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实际力量。两个超级大国凌驾其他各国的实力优势，以及它们在武器上（其威力之大，几乎已不能轻易动用）稳定的均势，始终是局势的关键所在。反过来说，欧洲的这种稳定又表明二十五年来欧洲两大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的均势实质上并无变化。冷战，作为美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阶段，也许结束了，然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就象一九四五年以来那样，依然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稳定与否的关键。大多数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是否能保持和平与独立，也取决于此。

现在就我使用的某些词逐一作些解释。我觉得国家“体系”这一概念有助于透过事件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但我并不自命独具创见，或者认为这个词是一种精确的说法。我用它是借以说明一批国家，它们长期以来的相互交往乃是其重大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

还要着重说明的是，我完全是在客观意义上使用“稳定”和“挑战”等词的。稳定不一定是好事，而努力去改变稳定也未必不好。相反，稳定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不公正的既成事实。例如，我十分清楚，以稳定一词来形容战后的欧洲体系，就意味着置下列事实于不顾：东欧国家并非自愿加入这种稳定；这种稳定限制了它们的独立；德国的分裂影响了德国人的情感；欧洲丧失自主地位伤害了许多欧洲人的感情。“稳定”一词不仅无视这些问题上涉及人性的一面，而且会使我们忽略下列事实：不得人心的稳定受到来自前述各个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挑战，这显然会使这一体系趋于不稳定；如果挑战强而有力，该体系甚至会就此崩溃。不过，仅仅使

用这些词来描述实际情况，并不会妨碍或影响我们根据伦理原则和实际经验来进行评价和分析。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既成的事实，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它们的性质，并尽可能探究出它们的缘由。

在这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在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了一九四五年以来影响欧洲的事件之后，我发现它们所带来的这种稳定，同其他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如果没有现在这个体系，又会有什么别的体系呢？它的“优越性”又在哪里呢？对此我们必须细加推敲。我为撰写本书作过研究，我发现有关现代欧洲历史和冷战的许多论述都断言，只要当初对某些问题不作这样决定，某些事态的发展就会改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不难办到的。因此，我一直非常注意战前、战时和战后历史上许多“本可以如此”的有争议的问题。要对这类“假定”的问题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而又毫不掺杂主观愿望，更有其内在的困难。问题在于我们掌握资料的情况：苏联方面的少得可怜，美国方面的又似乎过多。对许多问题，我宁可不作定论，不自以为是，以免有武断之嫌。尽管有种种局限性，得出的结论仍是我所未料到的。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作出不同决定，使事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如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欧洲形势不见得会因此而改观。也就是说，另一种趋势不见得会更有利于和平（在局势紧张、战机四伏的情况下，和平迄今未遭破坏）；不见得会改善欧洲国家当前的处境（它们已不能在旧国家体系内维护其独立，而在新体系中却多少能如愿以偿）；就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原则而言，它也不见得会更有益于“欧洲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大多数有争议的事情上，我并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能在事后凭空臆想的）决策者确有可能选择更为可取的其他前途，也不认为看来更合乎情理的其他决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战后十多年来，在时而剑拔弩张的严重紧

张局势中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毕竟创造了稳定的局面（哪怕是出于无意），可给以高度评价，至少也应该持论公允。总之，这一体系象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那样，有本有源，深深扎根于强权现实之中，即使算不上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至少也是顺乎自然的。

我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为冷战唱颂歌。人们为一九四五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出了许多牺牲，东欧国家和人民尤其如此。对美国来说，这代价不仅包括在两次大战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用于防务的财力、物力，冷战的紧张局势还使战时例外论的观点竟至在和平时期也得以继续作害，影响到美国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以及国家的社会思潮和道德风尚。

然而，即使公正地甚至苛刻地去看待冷战的一切代价和牺牲，我们也还是不能假设，事态如果不是这样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就会少一些。超级大国之间已不止一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根据一九四五年以后欧洲自身的力量均势来看，苏联会以某种形式控制东欧和西欧，这并非无稽之谈。德国苦心孤诣想通过武力或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来实现统一，似乎是异想天开，这只是因为冷战和新欧洲体系卓有成效，才使之化为泡影，而我们现在却忽略了两者的功劳。凡此种种，有可能取代当时的既成事实，但它们不会带来令人神往的前景。其他看来是更好的选择，一经推敲，也都是靠不住的。

我相信，欧洲的现状虽然与过去截然不同，但两者之间确实是因果相袭、一脉相承的。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样来看待未来才不失为明智呢？我们不能武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最重大的事件往往最难预测。我们尤其要避免仅根据现在的情况来推论未来。虽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却不妨试试，与埃勒特·洛夫博格一道来作一番有识见的思考。要做到这一点，最审慎的方法是把本书论及的现时的体制、做法、力量和趋势看成是未来必须与之较

量的对手。它们的作用越大，其背后的实力分量越重，将来有可能促使其变化的力量也必得强乎其强。本书着重研究我们在欧美关系问题上所处的现状及其由来，因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将来仍难免要碰到这方面遗留下来的问题。鉴古而知今，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未来和现状的关系。

说到本书所论及的问题，现有的经历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欧洲的这一新体系卓有成效地为其成员国完成安邦立业和维护和平这两项基本任务，算来已达三十年之久。这就有理由相信：如果该体系的基础，即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关系，没有发生真正重大的变动，那么该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职能只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仍将大体保持现状。西欧和东欧自一九四五年以来都经历了经济复苏和其他显著的变化，但是自从五十年代中期这个体系确立了现在的这种形式以来，并没有发生过真正重大的力量变动。自称预见到那种大规模力量变化的人，完全可以声称他们还预见到这个欧洲体系将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此，不应随声附和。我也不赞同这种见解，我认为这个从一九五五年维持至今（一九七八年）的体系，完全有可能再维持这样长的一段时间，直至二〇〇一年。至于过了那个响当当的日子以后又会怎样，即使那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稳定结局推崇备至的人也应该缄口不谈为好。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未来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

分析到此为止，所得出的结论对政府制定适宜的政策来说，是有启发的。尽管世界各地的种种国际问题都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仔细考虑与欧洲的关系还是有益的。并非是这种关系已岌岌可危，而是因为在一个变化激烈的世界中，这种关系正处于堪称楷模的稳定状态。然而稳定并不是事物的自然顺序，而是变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危及欧洲稳定的挑战会继续出现，更何况在欧洲已确立稳定关系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其他各地远非如此。欧洲内外发生的问题都会对其稳定产生反作用。如

果我们要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或加强这种稳定，就必须弄清楚稳定是怎样实现的，我认为这样做仍会有利于美国。

如果决策者和公众懂得，面对着田纳西·威廉斯^①所说的这个发狂地走下坡路的世界，美国在欧洲的作用就象历史的深根能造就一切那样自然，而且也能象一切有用之物那样天长地久，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支持美国继续在欧洲发挥其作用。事情果真如此，则欧洲人将继续信赖一九四五年以来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这一体系。只要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能这样做，这个体系会日益强盛和有用，日趋正常和持久，而不是退回到一去不复返的往日的一个过渡，也不会是通往想象中祸福未卜的未来的一个小小的中途站。寒来暑往，这个体系着实经历了一番风雨。至于该体系今后将会面临的许多挑战，看来也未必使它陷于绝境。这也可说是经验之谈。至于政策问题，既然可以调整，就更能从容处理了。

侧重于研究体系的结构稳定，也就是说，把保持这种稳定当作政策目标，这会引起一种误解，似乎主张永远执行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差强人意的现状的那些政策。这绝不是我的用意。为保持一种合人心意的稳定，盲目执行既定政策有时反倒是最不可取的。这一点，索尔兹伯里勋爵^②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

政治中最常见的失误在于因循守旧，死抱住旧政策的僵尸不放。一旦桅杆落水，你不会顾及一绳一木的前功而去抢救它们，而是一下子把这些累赘之物统统砍去。对于一项政策，也应如此，可惜往往下不了手。旧的政策尽管已支离破

① 美国剧作家，生于一九一四年，著有《欲望号街车》等剧本。——译注

② 罗伯特·亚塞尔·索尔兹伯里（一八三〇至一九〇三），英国保守党首领，曾三次任首相。——译注

碎，我们仍死死抓住它的碎片不放；甚至在这堆破烂被扔掉以后，我们还抱住碎片的影子。^①

但愿美国对欧洲的政策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对待政策问题，切忌先入为主；而制定政策，又必须正确认识历史背景。让我们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① 格温多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伦敦，霍德和斯托顿有限公司，一九二一年版），第二卷第145页。